

河南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再版说明

本书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11月出版，印6500册，早已售完。现根据读者要求，经略加修订后再版。参加修订工作的有陈美邑、张化宇、路庭训、马绍元、袁蓬。因时间仓促以及修订者水平所限，难免仍有讹误及记述偏颇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一九八五年五月

目 录

中共鄂豫边区党史简述·····	全中玉 (1)
河南最早的农民暴动·····	李鸿斌 (7)
回忆陈毅同志·····	张润三口述 张化宇笔记 (11)
我的起义经过·····	张 轸 (22)
我和李宗仁、白崇禧搞五省联盟的经过·····	张 轸 (33)
信阳民主活动纪实·····	李静之 (42)
灵宝起义经过·····	刘希程 (57)
豫西第三纵队起义前后的回忆·····	赵振歧 (66)
我所知道的刘镇华·····	张修斋 (73)
镇嵩军始末·····	尹文堂 (84)
张钫与二十路·····	范龙章 王凌云 史克勤 (116)
信阳毛尖茶概述	
·····政协信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组整理	(137)
河南柞蚕事业的过去·····	任醇修 (151)
道口义兴张制造烧鸡的技术特点和操作	
过程·····	张和礼 (158)
解放前开封相国寺的形形色色·····	陈雨门 (161)

中共鄂豫边区党史简述

全中玉

南阳地区建党开始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当时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后期。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各县涌现出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愿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而献身革命，而且愿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终身奋斗。各县开始建党时最先参加党的就是这批青年。在南阳地区建党比较早的是唐河、泌阳、邓县等几个县。有的县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建立了县委。国共合作分裂后，各地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摧残。但在南阳地区，因为建党才开始，组织没有暴露，所以没有受到破坏。

“八七”会议以后，根据上级指示，一方面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在各地号召发动武装斗争。当时我们曾在建国军教导总队发动过一次武装起义，在其他地方也发动过小规模武装斗争，但都没有成功。个别地方遭受一些损失，但不严重。一九二八年秋天，党的“六大”决议精神传达下来以后，在党内同时开展了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批判。明确了争取群众，积蓄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在这以后一、二年中间，南阳地方党组织得以稳步发展，没有遭到严重破坏。为了适应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需要，河南南阳地区和湖北襄阳地区的党组织合并，成立了鄂豫边区特委。这时，南阳地区的唐河、泌阳、新野、南阳、邓县、桐柏、镇平等县，

都有了中共县委组织。党的发展已由城市普及到农村，党员成分绝大部分是农民。到一九三〇年，南阳地区党组织经过了几年的发展，力量逐渐壮大，革命形势是很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边区特委根据中央指示，组织了几次武装起义：一是桐柏起义。起义部队在县委书记张士哲同志领导下，夺取了桐柏县公安局的武装，占领了县城，接着向县城以东的金桥镇进军，但未能攻下。由于缺乏军事经验，在敌人反扑时，起义部队被打垮了；一是杨虎城部第一旅的部分军队起义。这次起义是从这个旅的直属部队发动起来的，拉出来将近一个团的兵力。当时的计划是先攻下南阳，然后在鄂豫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在起义部队从舞阳向南阳进军的时候，攻打社旗镇，未能攻下来，被敌追击部队包围打垮了，领导起义的张唤民、白玉文两同志也牺牲了。特委在邓县组织的一次农民起义，由于多种原因没有发动起来。鄂豫边区特委在南阳地区组织的三次武装起义，两次失败了，一次没有发动起来，而在湖北襄枣地区发动的武装起义，却取得了成功。起义队伍夺取了襄枣之间几个市镇团防局的枪支，武装了自己。起义队伍当时只有几十个人，以后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红九军二十六师，在鄂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这个根据地一九三〇年建立，一九三二年在反四次围剿期间被敌人摧垮了。南阳地区几次武装起义又失败以后，革命力量遭到重大的损失，桐柏、邓县地下党的组织完全被破坏，原来在南阳轰轰烈烈开展着的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都被敌人镇压下去了。只剩唐河、泌阳、新野、镇平这几个县有党的组织。南阳虽然还有县委，但不论在城内或在乡里，党员人数都很少。紧接立三路线之后，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三一年秋冬之交，南阳第五中学和宛南中学两校党支部又遭到破坏。一九三二年春，泌阳、唐河两县党组织在领导农民进行抢

粮分粮斗争中，遭到很大损失，泌阳县委负责同志周青、吕秀甫牺牲了，唐河县委也有人被捕。一九三二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鄂豫边区特委改为鄂豫边区省委。为了加强对鄂北根据地的领导，省委机关由南阳迁到鄂北根据地。一九三二年的下半年，鄂北根据地被敌人摧垮，省委成员只有几个人回到南阳。一九三三年夏天，因为叛徒告密，省委机关和南阳中心县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两个同志被捕。这时鄂豫边区的革命形势降到了最低潮。

继鄂北根据地被摧垮之后，边区省委机关又遭到了破坏。这时鄂豫边区剩下的革命力量，只有唐河、泌阳、新野、镇平四县农村中的一部分中共党支部，党员二百多人，他们既失去了领导机关，又失去了和中央的联系，当时处境，岌岌可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几个县的主要领导干部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组成了一个临时领导机构——鄂豫边区工作委员会，由张星江同志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张旺午同志任宣传部长，继承省委的职责，继续开展革命工作。在这次会议以后，我们着重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研究了过去所以长期遭受失败的原因。我们感到，过去经常强调的是要着重抓群众斗争，从斗争中求发展，从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从政治斗争转变为总同盟罢工，进而发起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这一套公式是使党组织经常暴露因而遭受摧残和破坏的主要原因。以后必须改变这种做法，必须想办法使党组织尽量少受破坏，在生存中求发展。根据这一精神，我们决定加强秘密工作，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不设机关，工委几个成员分片包干，长期住在农村，不要文字指示，开会不作记录，指导工作靠口头传达；不开三个人以上的会议。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在以后三年中，不仅避免了敌人的破坏，而且取得了发展。一九三三年秋，南召县开始建党。先在这个县的

简易师范学校建立了一个学生支部，以后逐渐发展到乡下，一九三四年建立了南召区委。在新野县东南区也建立了新的区委。这时各县党员总数共计三百多人。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我们开始筹划发动游击战争，准备在桐柏山区组织小规模 的 游 击 队，逐步发展壮大，推翻当地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工委虽然有这样一个计划，但实现这个计划并不容易。正在这个时候，原来在河南省委工作的王国华同志和我们取得了联系。由于河南省委领导下的各级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他愿意到鄂豫边区来工作。从这以后，确山、信阳一带的一些党员也受鄂豫边区领导，这就为我们在桐柏山区发动游击战争造成了有利条件。一九三五年秋天，鄂豫边区工委改为鄂豫边区省委，仍由张星江同志任省委书记，我任组织部长，王国华同志任宣传部长。一九三六年元月，在省委领导下，集中了七个同志三支枪，由张星江同志亲任政治指导员，周骏鸣同志任大队长，组成了一支红军游击队，在信阳西北吴家尖山、小石岭一带开展活动。到三月间，部队扩大到二十余人，十几支枪（参加部队的人，多是各县动员来的党员）。有一次，部队在确山县西北老乐山东边杜庄宿营，被敌人包围，在突围中王国富同志牺牲，七个同志被俘。一个多月后，部队又发展到二、三十人。在桐柏县平氏镇附近的一次庙会上，部队对反动武装进行了夺枪。这次夺枪很顺利，没有遇到多大抵抗，就夺得了六支盒子枪，但在归途中被敌人追击，张星江同志中弹牺牲，周骏鸣同志负伤。张星江同志牺牲后，由我担任省委书记，王国华同志任组织部长。到五月间，由于敌情紧张，部队分成三个分队，转入到外线活动。由我带领的一个分队，在唐河、新野一带活动。三个多月中间，向敌人出击十余次，缴获长短枪八支。在一次遭遇战中，有两个同志牺牲了。敌情紧张是暂时的，两

三个月后，敌人从游击区几个镇子上撤走了，我们的部队仍然集中行动。到“双十二”事变后，部队发展到五、六十人，各县的党组织也在稳步发展。这时省委和部队上的负责人进行了一次调整。王国华同志担任了省委书记，周骏鸣同志任组织部长，我到部队里任政治指导员，陈香斋同志任大队长。一九三七年元月，部队以全力作发动群众的工作，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在泌阳以东山区，普遍建立了农民抗日自卫会。到二、三月间，部队从泌阳以东到确山县境活动。在这一段时间里，打开过两家地主的炮楼院子和一处土寨子，共缴获了十几支枪，部队人数由原来的五、六十人发展到一百多人。四月间，接北方局指示，要我们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停止打土豪分田地，停止向国民党进攻；派人和国民党谈判；部队可以改变番号，改编为合法性的地方武装。我们接到这个指示以后，感到执行有困难。我们不进攻敌人，但敌人还要进攻我们；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军队的发展壮大以及军需给养的筹备，都将无法解决。当时我们采取的方法是，一方面向北方局提意见，要求暂不执行这一指示；另一方面派出部分队伍，配合地方同志以打汉奸名义继续打土豪。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曾两次进攻敌人据点邓庄铺，在第二次进攻这一据点时，陈香斋同志牺牲了。由于部队在大发展后成分不纯，政治思想工作不扎实，曾发生两次拖枪逃跑事件。以后采取了紧缩方针，部队人数缩小到五、六十人。这时鄂豫边区省委和省委所在地的泌阳东区，接连受到敌人的三次破坏，有十一个同志被捕。在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后，王国华同志就一直住部队上。六、七月间，周骏鸣同志从延安回来，带回了中央指示，叫我们仍然执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在合作抗日实现之前，不能停止军事行动。这样，部队执行什么政策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在这个时候，省委和部队

的负责同志，又进行了一次调动，由我担任省委书记，中央派来的胡龙奎同志任组织部长，王国华同志任部队政治指导员，周骏鸣同志任大队长。“七七”事变前，北方局派来了刘子厚同志，担任省委统战部长。“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开始，整个形势起了显著的变化，部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这年秋冬，部队发展到五个连，改称为独立团，并打退了敌人几次大规模的进攻，先后攻克了邓庄铺、贾楼、竹沟等敌人据点。农民抗日自卫会的群众组织，在泌阳以东从山区到平地，普遍地组织起来了，革命根据地的规模初步形成了。这年年底，部队进驻竹沟。一九三八年一月，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并于这年春天开赴抗日前线，这时兵力共三个营约一千余人。一九三八年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时期，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新的县委和地委相继建立，在此基础上，新的河南省委建立起来了，鄂豫边区省委的历史到此结束。

我个人所知有限，对于鄂豫边区党史，只能作一概要叙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断送了革命根据地百分之九十，白区党组织几乎百分之百被破坏。鄂豫边区党组织之所以能在王明路线时期渡过危机，取得发展，并进而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一支军队，是因为同志们摸索的道路，符合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总结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可以提出以下几点：①秘密，是地下党的生命，左倾暴露等于自取灭亡；②乡村，特别是反动统治鞭长莫及的偏僻山区，是我们发展组织保存力量和发展游击战争最适合的地方；③采取小规模发动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更能使武装斗争取得成功；④边区几个县的地下党组织的存在，是部队能够发展壮大基础。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

河南最早的农民暴动

李 鸿 斌

一九二七年农历三月间，确山县农民暴动，攻破了县城，消灭了军阀部队一个团，囚禁了县长，打倒了四个大劣绅，播下的革命火种，一直烧到解放。

暴动是在一九二六年秋就开始酝酿、鼓动、串连。当时北阀的革命烈火已烧到长江，但长江以北，仍是军阀统治着。第八军魏益三部住信阳，确山住了他的一个团，驻马店也是他的部队。

军阀混战，各霸一方，就地搜刮百姓。当时粮银（即田赋），确山旧制五十六亩地合一两粮银，农民按亩折合粮银来完粮。每两粮银纳正税二元二角（上交省），县地方，还有名目繁多的附加税，多于正税的好几倍。地方如有新的开支（如兵差等），还可随时附加，随粮代征。这样还不够用，又实行预征。如一九二六年，粮银就已预征到一九三七年。而且每年要预征两三次。军阀直接下令，要确山县每两粮银再加征十元，以作军费。农民不甚赋税之苦，愤恨至极，听到每两粮银再加征十元的消息，真是火上加油，被逼得走投无路，只有起来反抗。

军阀部队的军费、粮秣，全由地方负担，官兵还到处抢掠。当时县政府设立兵差局，承办支应兵差事宜，用费由粮银附加代征。兵差局应差人员就有一百多人，他们花钱无度，还要饱藏私

囊。农民说：“兵差局是无底坑。”是一个官绅勾结，官兵勾结，绅兵勾结，搜刮百姓，贪污中饱的机构。

当时，确山农村普遍有红枪会组织。一九二六年秋，共产党员马尚德（李湾人，即东北抗日义勇军领导人杨靖宇的本名）、李鸣岐（后在开封被害）、张耀昶、张家铎（均系驻马店人）、徐中和、徐子荣弟兄（傅楼人）、孔凡懿（王坡人）等昼夜奔走各乡，串连鼓动，发动青年积极分子，鼓动他们出头露面，号召抗粮。经过一冬一春的串连鼓动，响应的人越来越多。当时群众中传播这样两句歌谣：“豌豆角皮叭板，红枪会打老陕。”当时驻军多是陕西人，当地农民最恨他们。农历三月，正是豌豆花盛开和结豆角的时候。歌谣预示了红枪会斗争的目标和农民暴动的日期。在共产党领导下，于农历三月间，四乡红枪会数千人，手持红缨枪、大刀和极少数步枪，齐集东关外火神庙戏楼前开会，群情激愤，反对加粮，反对把持县政鱼肉百姓的劣绅。当场提出打倒大劣绅魏景仲、楚向荣（即楚本固）、何鸣一、田斐卿四人。魏景仲是劣绅中守旧派的首领，省议会议员，家产甚富。楚向荣虽系较小的绅士，但得到当时县长的赏识宠信，煊赫一时，作恶多端。何鸣一是公款局长，掌握县财政大权，贪污甚多。田斐卿系另一派的首领。当时的口号是打倒魏、田、楚、何四大劣绅。

群众向东关进发，准备进城捉拿劣绅。驻军关闭城门死守，不让进城，于是围城，四面攻打。

红枪会多是来自城南、城东、城北三方面的人，如普会寺、独山集、刘店、陶庄桥、李湾、驻马店、朱胡同等，都是平原地区来的，团团围着县城，日夜攻打。先占领了二郎山、盘龙山、蒸馍山，俯视城内，一目了然，占了居高临下的优势。

各乡争先向前线送饭，有蒸馍，有烙饼，有窝窝头，人抬肩

挑，从四面八方而来。支援攻城的群众络绎不绝。

第八军既慑于北伐军的声势，又慑于“红枪会不怕枪炮”的神奇说法，在第三天夜里，一部分开了西门向北逃窜，企图去驻马店与那里的部队会合，但在中途被红枪会歼灭了。

天拂晓时，红枪会攻入城内，残留的第八军全部被红缨枪刺死，尸体成堆，大街小巷都可看见倒毙的军人。西门外也有许多尸体，是逃窜时被杀的，红枪会的人无一伤亡。

县长王少渠被俘，押在监狱。四大劣绅虽已逃跑，却抄了他们的家。魏景仲住北大街，最富，宅基一大片，几节院子，所抄的东西最多，从地下、墙壁中挖出不少银元。楚向荣、田斐卿家底较薄，也遭到抄没。何鸣一是城西何大庙人，家不在城内，他本人隐匿在西门里高景昉家内，城破后第二天钻到酒瓮里，用牛车拉出西门逃走了。

红枪会入城后，只抄四大劣绅的家，对市民秋毫无犯，市面安然，商店照常营业。

河南确山县的农民暴动成功了，建立了县的党组织^①和县临时治安委员会，主持县政。劣绅们并不甘心失败。魏景仲父子逃到尚和店杨子禄家（城西南四十里大山里），何鸣一逃回何大庙（城西三十里山区）。这两人在乡间是有很大影响的人物，到处活动，唆使各乡中小地主成立所谓义和团，以示与红枪会有别。串通杨子禄、张养浩、徐渭泉、高景昉等于农历六月间聚集义和团数百人围攻县城。

在暴动成功后，四乡红枪会群众回家生产（当时进入农忙季节），城内革命武装不多。共产党员马尚德、张耀昶、张家铎、王益民、徐中和、徐子荣、李彩岑、阎海亭、李泮林等率领革命群众，组织“光蛋会”，专吸收贫苦农民，不准有钱人参加，

纯洁了革命组织，已不似红枪会打城时期那样混杂了。活动区域，由县城东南独山集，沿汝南、确山交界向北伸延到吴桂桥、陶庄桥、马庄、李湾、驻马店、岳庵一带，武装群众打土豪。当时打死了汝、确交界土豪张振东，抄了家，烧了他的房子。刘店豪绅赵炳文逃跑了，抄了他的家，烧了堂楼，杀死了吴桂桥土豪吴某。这种情况各地很多，扩大了革命影响，坚持一年多。虽然由于革命低潮到来，“光蛋会”也转入地下，但毕竟在确山播下了革命种子。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五日）

①县的党组织，指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确山县党部。

回忆陈毅同志

张润三口述 张化宇笔记

一九二四年，我进入北京中法大学学习，是第三届的学生。在我入学的时候，第一届的同学已经毕业，正在准备出国，由范秉哲同学同我接洽把宿舍、伙房连同炊具移交给我们第三届的同学。我们住的宿舍建筑在碧云寺围墙的外面，依山靠水，景色宜人。据说原是天然疗养院的病房，因为病人少，围墙里面的房子已经用不完，就暂时作了学生的宿舍。这一风景优美的疗养胜地，倒是我们安心读书的好地方。学校从法国购买了许多文艺书籍，我买了莫泊桑的《菲菲小姐》、《人心》作为课外读物。那时，我同陈毅同志还没有什么接触。后来，因为跟他班里一个同学林某（是文学家林琴南的孙子）发生口角，两班同学几乎要打群架，陈毅以老学长的身份出来调解，避免了冲突，我和陈毅同志也就开始认识了。

陈毅同志字仲宏，四川乐至县人。他原在法国勤工俭学，因参加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和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校址的活动，要求生存权、求学权，中国驻法公使陈篆，把他们的正当要求，诬蔑为流氓行动，无理取闹，勾结法国政府把他们强行押解回国。他是在一九二三年进入北京中法大学的，比我早一年。

有一次，胡适来校讲学，题目是《谈谈读书和翻译》。在谈读书方面，他反对两种倾向，一个是“桑皮纸”学者，好象什么都知道一些，什么都不精，这样做学问，浅薄无聊，决不会有什

么成就的。一个是“寡头”学者，只钻一行，知识面非常狭窄。俗话说，“牡丹花虽好，还要绿叶扶持”呢。他主张“为学犹如金字塔，又能博大又能高”。在谈翻译方面，他强调尊重原著，忠实于原著，要多查字典，做到译文准确无误。他最后念了一个顺口溜：“多攒几个钱，少买几亩田，千万买部好字典。……你携它到天边，你若常常请教它，管保你少丢几次脸。”胡适走了以后，陈毅同志说，胡博士今天劝我们买字典，要尊重原著，可是他的翻译并不尊重原著。我们都读过他译的《二渔夫》，对一篇小说题目，随心所欲地胡翻乱译，把“朋友”译为“渔夫”，还说什么忠实于原著。陈毅同志这一番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打破了长时期对胡适的偶像崇拜。

我在中学时期，喜爱看《小说月报》，尤其爱读王统照的一些短篇小说，如《相识者》、《黄昏》等。陈毅同志曾经介绍过有关王统照的情况，因为他们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陈毅同志这时已在从事写作，写了一些诗歌和小说。对于法国文学，他喜爱雨果的作品，说雨果是站在巴黎公社一边的。由于陈毅同志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对同学们的影响很大。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以后，冯玉祥、张作霖推举皖系军阀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由于反贿选的同盟关系，孙中山先生准备到北京来。同学们为了迎接孙中山先生，曾经几次商量。大家谈国民党，谈孙中山，也谈我们的校长李石曾。我初到北京不久，为李石曾的一些假象所迷惑，认为他是跟孙中山干革命的，是一个学者，很清高。李石曾和一些教授组织了一个“进德社”，约法三章：一不做官，二不娶姨太太，三不吃肉。我总是宣扬他的约法三章。陈毅同志却说李石曾是一个政治骗子，不要看他表面上说什么不做官，他是不做小官。陈毅同志的话，后来都证实了。段

祺瑞政府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李石曾当了委员长，又当了故宫博物院院长。这些机构并非清水衙门。后来易培基、李玄伯（李石曾的胞侄）等故宫盗宝案件就是在他的庇护下搞的。

陈毅同志说李石曾是政治骗子，我们从解决金法郎案问题上也可以得到证实。法国退还庚子赔款作为整理中法实业银行的借款基金，并以其中之一部分拨作中国教育经费，一九二二年正式签定中法协定。在中法实业银行复业协定中规定，每年以退还赔款之一百万金法郎作为中法教育之用，共二十三年，计二千三百万金法郎。法国坚持要用金法郎付款，北洋历届政府害怕遭受物轻议，不敢于解决。李石曾为了这二千三百万金法郎，通过各种关系，促使段祺瑞政府解决了所谓金法郎付款问题，使国家遭受了巨大损失。李石曾却利用机会掌握了法庚款的支配权，以增加他把持的中法大学的物质基础。

有一次李石曾给我们讲演，大肆吹捧无政府主义。介绍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在谈到论财产这部分时，他用法语说，财产是什么？财产即贼赃。企图用以说明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彻底性。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新鲜的东西，但在世界范围已经陈旧了，我们反对守旧，守中国的旧不好，守西洋的旧也不好。他还在黑板上写了一副对联：“勿守中西旧，须维世界新”。陈毅同志为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思潮，在学校散发并介绍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等著作，和李石曾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二五年，我由路友于、常之熙介绍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的一个组织“大同盟”。当时大同盟和共产党合作。我们学校区分部只有四、五个人，陈毅同志所在班里有陈毅、谢光汉、王耀宇等。他们都是跨党的。我所在的班里就我一个人，属于他们的统

战对象。我们团结的政治基础，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我们斗争的对象是北洋政府的反动势力和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为了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共产党、大同盟、实践社等结成了统一战线，加强北京特别市党部的竞选活动，商定了执监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尽管有商定的共同名单，但各人仍准备有自己的名单。我们的选区在农业大学。常文熙已经交给我一个名单，在从西山往骆驼庄去的路上，陈毅同志也交给我一个名单，他是这个选区的监选人之一。我对这两个名单一时难以抉择，就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两个名单各选一半。我记得在共产党拟定的名单上我选了陈毅、杨景山、刘清扬等，在大同盟拟定的名单上，我选了郭春涛、邓飞黄、王振均等。我的选票还没有写完，陈毅同志走到我跟前一看，问我为什么没有按照他交给我的名单写，我唯唯否否，应付过去。

一九二五年暑假后，学校在东皇城根新建了校舍，我们就搬到城里，服尔德学院和居里学院都招了新生，同学人数大大增加。这时陈毅同志已到北京市党部工作，成了一个挂名学生，在学校里很少看到他。他对学生运动还是抓得很紧，经常回来作时事报告。学校的一些活动主要由谢光汉负责。在这期间，北京学生进行了很多革命活动，如反对关税会议、首都革命^①等。规模最大的是首都革命。在神武门前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学生，也有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学生还组织有敢死队，浩浩荡荡地去包围段祺瑞的吉兆胡同住宅。在向吉兆胡同进军中，陈毅同志亲临指挥，有时上到房顶上指挥队伍向前冲。领导喊口号，“打倒段祺瑞！”

“枪毙朱霖！”喊口号把嗓子都喊哑了。从下午三、四点钟一直到夜晚，最后由鹿钟麟（冯玉祥系，北京卫戍司令）出来劝解，群众始行退去。包围吉兆胡同的学生解围以后，分头到李思浩、姚